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王烜,余陈一. 去中心化信息时代实证主义新文科挑战及应对[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8(3): 55-60.

去中心化信息时代实证主义新文科挑战及应对

王烜 余陈一

(江苏大学 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要: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作为实证主义人文社科学科,共享定性研究方法与民族志书写传统,具有深厚的学科渊源。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亟须突破传统界限,构建以实证主义研究(与文史哲相对)为核心的新型综合文科。信息时代,实证主义新文科面临去中心化传播与反智主义思潮双重挑战,实证研究中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发生嬗变,应跨学科协作,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关怀的新文科范式,采取数字田野、学术透明化、技术赋能等跨学科整合策略。各个学科应该摒弃自身的局限,调整学科视野,坚持走出去,主动寻求合作,共享研究对象,突破研究壁垒,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化解信息社会中实证主义学科的发展困境。

关键词:新文科;实证主义;反智主义;民族志;信息时代

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3-0055-06

2021年3月2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要求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2021年11月2日,教育部公布了首批认定的1011个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此举标志着酝酿数年的新文科建设跨出了实际操作的一步。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应提倡跨学科合作,整合人文社科诸学科,逐渐消弭学科之间的鸿沟,构建注重实证主义研究的新型综合文科。

一、实证主义诸学科关系重构的必要性: 民俗学的困境

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等具有颇深的渊源关系,共享定性调查研究方法和民族志写作方法。从学科史的角度来讲,中国民俗学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历史悠久,《荆楚岁时记》《风俗通义》等古籍

较早地将民俗研究引入学科视野。中国民俗学自现代学科建成伊始就与普通民众站在一起,被称为民众之学。历史上,民俗学曾迎来两次重大的发展机遇:一是改革开放时期传统民俗复兴,一是21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潮。^[1]但民俗学走得慢,飞得不够高。所谓飞得不够高,一是指其所做出的学科贡献没有赶上学科遇到的诸多机遇;二是指其学科站位不够高,没有发挥出人民之学的强大生命力,成为边缘化的基础学科。民俗学处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三分天下的夹缝,颇为尴尬。

立足于中国本土发展的民俗学,其学科基础却并不强于舶来品的人类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肇始于西方殖民者在大航海时代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对当地民众文化的解释,其起源带有强烈的西方话语倾向,即西方世界代表文明,非西方世界代表某种自然状态,象征愚昧、无知甚至野蛮。人类学作为西方野

收稿日期:2025-02-10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高级专业人才培养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婚育文化制度现代化建设研究”(5501550006)

第一作者简介:王烜(1988-),女,陕西西安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女性主义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民俗学研究。

蛮扩张的助推者,将西方通过“血腥战争、话语霸权、‘零和游戏’逻辑”的财富积累过程合理化,其研究成果充斥着西方“俯视”其他文明的猎奇乃至一厢情愿的文化解释,比如学界对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批评和反思。^[2]

民俗学虽与其他实证主义学科共享定性调查研究方法和民族志写作方法,但同时也造成了其学科属性及定位不清,学术成果分散,影响力较弱等问题。视野上的局限和短板,让民俗学在很多研究领域被社会学和人类学抢了先机。社会学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和解释作为研究重心,其重要性和应用性不容忽视。人类学本是舶来品,具有洋范儿、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确、高趣味,即使研究对象一样,也以其强大的理论背景轻易碾压民俗学。民族学基于我国特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需求下得到了长足发展。西方民俗学肇始于欧洲民族主义,中国民俗学则打破民族与国家的藩篱,突破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组成发扬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文科。

笔者认为,民俗学的现时困境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基于本土研究的民俗学者需要反思研究视野的狭隘和学科在学术等级中位次较低的现实。民俗学者的研究兴趣往往来自他们自己的原生背景,以及希望这种背景被承认和赏识的愿望。从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来说,这批人恰恰来自于强社会资本的关系较少、社会背景较弱的地区。^①刘铨、陈鹏认为:“‘寒门出贵子’的中国现象从法国布迪厄和英国威利斯之间的理论缝隙中穿过,最终将‘读书的料’的三类品质——主动与学校文化深度合作的‘学校化心性品质’、天生不甘于命运的‘先赋性动力’和把学习视为道德事务的‘道德化思维’——提升为‘底层文化资本概念’。”^[3]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在打破精英主义秩序的同时又落入了另一种‘底层精英主义’,丢失了社会学的批判本性,为现有的价值

分配规则‘唱赞歌’”^[3]。

拓展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已经成为民俗学的当务之急。人类学强调国际研究视野,社会学强调基础理论运用,民族学推崇少数民族身份。民俗学人往往具有深厚的乡土背景和联系,他们或来自乡村,成为寒门贵子改变命运的典型;或有着与乡村紧密的联系,进行间歇性访问。周星指出:“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知识界过度礼赞传统、耽溺乡愁,以及在抢救、保护和传承等话语表象之中将乡愁审美化的趋势进行一定的批评,以促请民俗学界同仁明确自身更为重要的学术使命与可能性,亦即直面现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及其变革的历程,记录和研究无数普通的生活者,是如何建构各自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并在其中获得人生的意义。”^[4]

在北美地区的英语区,民众日常自称 folks,这扩展了最初 folk(农民)的含义^②。folk 在今天的英语世界里涵盖了一切民众,只要是自称为 folk,就可以被当作 folk。比如,欧美人群发电子邮件的第一个称呼,就是“hi, folks”。由于 folk 的概念被拓展至所有民众,folklore(民俗)的指代和研究范围也随之拓展,并使得常人的兴趣显著提高。之前,人们曾辩论贵族算不算 folk 的一员,现在看来,各国王室女眷的八卦和时尚在中国大众媒体的呈现及其对普通人的影响,也可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任何一个群体形成惯习的日常表达(比如趣缘群体),包括美国哈利·波特同人文化的群体^[5],以及 BDSM 等特殊兴趣爱好的群体^[6],都被西方民俗学者纳入研究范畴。另外,北美学者普遍自称 folks,也从根本上把自己与大众放在一起,与精英分离开来^③,因而有了更广阔且不受限制的耕耘园地。

在过去,民俗学被置于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这使得民俗学困惑于自身属于人文还是社科。而在新型综合文科中,人文与社科的分野可以消弭。社会学旨在解决社会问题,是经世致用之学。但是,社会学里的人类世界不可能是完美的,总有种族、性别、阶级等问题等待被解决,学者因此失去了抬头看天

①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folk”概念在欧美和中国是如何发展的,详见户晓辉:《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户晓辉:《论欧美现代民间文学话语中的“民”》,载于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载于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民俗学系教授 Diane Tye 认为,精英代表那些掌握实权,可以决定国家发展前途的人,而民俗学者大多自谦为民众(folks),是和研究对象平等地站在一起的,践行着民俗学“emic”(内部视角,相对于人类学的“etic”外部视角而言)的自我定位。

的能力,充满抑郁和不满。而民俗学是浪漫之学、欣喜之学,具有极强的文学性、美学性和艺术性,是正能量的学科,是具有幸福感的学科。它研究的一切,都是由民众内心生发出来的美好的东西,比如故事和节庆。因此,民俗学也被称为大众心理学。

二、去中心化信息时代实证主义调查者与调查对象关系的嬗变

信息时代,去中心化趋势深刻地改变了实证研究中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在今天,民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产生了位移,田野调查和互惠民族志以及合作民族志的写作开始变得艰难,非虚构写作的书籍(如《九路口》《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惹作》等)常常在出版后受到读者和被调查者的大规模质疑。普通民众在网络空间可能同时扮演着研究对象和网络暴力参与者的双重角色,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面临严峻挑战。如何看待实证主义研究中调查对象和调查者的关系,在反智主义昌盛的时代,被重新提上日程。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最开始由美国理论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7]旧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精英的傲慢、科技的发展,使反智主义在美国达到巅峰。社交媒体时代,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结合,通过低成本传播影响政治进程。^[8]具有克里斯马气质的舆论领袖只要掌握了群体的特征,就能进行低成本宣传和洗脑。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研究群体心理学的经典之作,该书指出,群体的匿名化可以使个人不负责任,因而易于产生“平庸之恶”^[9]。勒庞认为,群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比如,低下的思考能力、判断力与逻辑,因而谎言极易被传播和相信;当偶像有意对群体进行洗脑时,群体即陷入狂热;群体只会被极端的情感打动;群体极端排斥理性与逻辑;群体没有负罪感;群体天然合理,合乎正义,偏执专横,渴望强权。^[10]关于民众是否有足够的行为能力和意识做出理性、符合道德的决定,不同的学派持不同的观点。然而,妄想个体能够不受群体的影响,成为独立思考的理性人,这个愿景在西方百余年的政治实践中,已被诸多事例证明失败。^[11]塑造一个能够通过理性思考进行决策的公民团体是困难的,现在西方欧美社会的乱象再次证明了乌合之众理论的普遍性。

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就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随着知识共享,接触和搜集信息的门槛降低,掌握新的学习方法和手段越来越简单。学历

贬值,上升通道关闭,特权阶级在公私领域引起公愤,“开盒”“起底”等恶性网络现象越来越普遍。知识分子一方面对自己保有的知识存疑,另一方面也不再自信以高位者(调查者)的姿态去调查、访问民众(被调查者)。田野调查中动态的主客体、主动与被动关系曾在合作民族志和互惠民族志的研究实践中得到初步的探索,但知识时代的来临还是为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影响。

民众重新看待知识分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信息的传递速度在新时代大大快于过去,信息搜集获取的方式产生巨大进步。在信息爆炸时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优势与权威正在消解,学术训练并未赋予他们更高的信息检索效率,甚至可能很快被人工智能超越。学历贬值、AI在工作中的应用使得对知识的辨认、判断和整合能力在赛博时代变得微不足道。没有人有耐心去看完一篇耗时十分钟的文章,半分钟的短视频都可能会被认作太长。要在极有限的时间内言之有物,不仅考验讲述的内容和脚本的策划,还考验讲述人的口才与引人入胜的程度。而大众更偏好短视频等碎片化内容,学者在传播力与吸引力上往往不及娱乐化表达者。知识分子跌下神坛,舆论领袖岌岌可危。

其次,热点层出不穷,大家的关注度被分散,社会进入没有真相的“后真相时代”^[11]。人们对于24小时前的热点的关注度降低,如果无人主动追踪,很多讨论就不了了之,深度讨论成为奢侈。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获得的信息是真相,或者接近于真相,因为没有别的信息源可以佐证。人们就在这种将信将疑的情况下获取信息并作出决策。然而,将信将疑还是一种较为负责任的态度。大多数网民和普通群众,事实上并不具备这种批判性思维。“喷子不仅传播假新闻,而且攻击真正的新闻,并诽谤真正的新闻来源,他们释放大量的谎言和半真半假的信息,蜂拥而上,堆积如山。喷子不需要考虑说服力,它只需要令人上瘾。像病毒一样,它所关心的只是复制和传播。喷子是反社会的,拒绝任何建设性的目标。它所做的就是散布混乱,破坏信任,让人无法确定任何事情是真实的,也无法确定任何人是正确的。”^[12]而有批判性思维的谨慎发声的人,在社交网络中被隐形了。因为他们的中立和理性是沉默的,而位于中立两端的二极管,是最显而易见的,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在这个知识分子普遍保持一定的操守而不参与水军骂战的过程中,他们的影响力再一次被民粹肢解,分崩离析。

再次,学术研究的准入门槛降低,学者遭遇身份认同危机,影响力一落千丈。随着大学扩招,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社会调查的系统教育和写作训练,获得硕士、博士学位,随后进入业界。因此,可以看到,很多新媒体的运营者具有和学者不相上下的学术水平,体现在文章中,就是往往会在文末列明参考文献。以界面文化、虎嗅、36氪和Know yourself为主要代表,这些平台的文章简洁,有逻辑,可读性强,又有准确的信息来源做背书,比学者写的论文传阅度高得多。可见,学者的准入门槛和坚实基础逐渐被侵蚀,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大众科普读物作者,学者和非学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学者的身份认同遭遇危机。

反智主义并不是指有一个相信地平说或阴谋论的群体,而是代表了对智识阶级具有敌对心态的普通民众。而智识阶级受到排挤的现象,普遍发生在历史上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权威消解时期。权威的消解成为反智主义的主要表现。“后现代状况下,界限分明的阶级政治让位于更为散播、多元化的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通常有意识地彰显出边缘化的身份,以对抗占统治地位的话语。”^[13]在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中,士大夫曾享有至高权威,但随着社会扁平化发展,公众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短短数年间经历了从尊崇到怀疑再到鄙视的剧变。特别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贴上“公知”“砖家”“叫兽”的标签,使得更多源自此阶层的人选择了沉默。

无权威、反传统,则易导致礼崩乐坏。批判没有代价,因此与反权威并道而行,造成了现在网络社交媒体盛行的批判文化。批判文化亦造成了赞扬和宽容文化缺失。偶像来自于人们的崇拜,但是无权威、批判文化盛行,则使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瞬间从神坛上被拉下。即使是悉心维护人设的偶像,也随时面临崩塌,当代青少年的粉圈乱象就是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人们无法接受完美之外的丝毫不完美,也就是将偶像非人化。赞扬文化缺失,由于失去了对美丑、对错、正误的判断,理性的土壤被侵蚀,这阻止了恒定稳定的社会价值的产生。不论是对偶像还是对个人,稳定、全面、中立的评价和判断,是加深理解的基础。但是,在批判文化盛行的背景下,这种缺乏宽容的非理性的认知方式阻碍了美的产生。纵然不加判断地赞扬一切是虚伪的,但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一切,将把人类领入无知之地。

曾经,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深入普通人的生活,形成了具有文化资本的调查者与缺乏发声渠道的调

查对象的高地位关系。而今天,调查者的身份已经式微,因为普通人本身已经掌握了远远超越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发声平台,并且在这些平台上具有比他们更大的影响力。当民众发现学者跟自己对于基本问题持有不同见解的时候,他们是否还愿意合作?访谈和调查的效果是否会打折?这是否意味着,学者和被调查者必须处在去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真空安全地带,因为共识已经变得越来越稀有?随着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抬头,加上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民众是否仍然具有与学者合作的潜力?

事实上,最开始进行民众文化研究的学者均来自智识阶级,包括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中国的《歌谣》学派、日本的柳宗悦等。现在,知识分子从特权阶级变成了普通群众的一部分,其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必然产生变化。不能进行准确自我定位,就难以开展以民众生活为核心的实证主义研究。学界的批评,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有建树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知识分子和“喷子”最大的区别。如施爱东所言:“同行之间的学术批评不应针对学术取向和选题,有效的学术批评应该针对作为‘普通的学问’中那些有违学术规范、学术伦理,或者有助于提升操作水平的具体问题……而不是打击同行的研究领域、学术流派或书写范式。”^[14]因为研究方向和范式不同而对同行进行打击,是自掘坟墓的行为。如果人文科学者内部都不能形成有益的讨论和共识,那可想而知,人文社科的土壤将日渐贫瘠。

笔者认为,对智识阶级的尊重,不仅仅是在等级制上服从权威,更多的是对智识、伦理、艺术的认可。“与欧洲不同,美国被认为是反智的,薪酬体制的不均衡便是证据。职业运动员的收入往往比大多数有成就的教授要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职业运动员亦是娱乐大众的人——他们的工作是去取悦其客户和金主。使命感更强的教授并不去‘娱人’而是‘育人’,他们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从奥林匹斯山上收集到的,曾经被称作‘智慧’的东西。简而言之,这些教授是‘大脑’,而那些职业运动员则是‘肌肉’。‘大脑’的身份使得在其位之人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绝不需要进行没用且没品的自吹自擂。”^[15]

三、去中心化信息时代实证主义学科融合的实践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实证主义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可以借助以下路径重建。

(一)方法论层面

实证主义学科亟须从工具共享迈向范式创新。例如,人类学的深描方法能为民俗学的微观叙事提供理论支撑,民俗学的局内人视角也可以拓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并反思异文化的研究范式。另外,可以开展数字田野调查,利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观察网民自发的文化实践,通过已经成型的文字图像资料做量化分析,而非仅依赖面对面的质性访谈。在元宇宙、游戏社群中开展虚拟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关注数字化身的文化表达。结合大数据分析 with 深度访谈,从单点调查到多维验证,交叉验证网民的网络言论与线下行为。通过 GIS(地理信息系统)定位、社交网络爬虫等数字工具赋能传统的田野调查,将传统民俗学的村落研究拓展至 B 站等都市虚拟社区。

(二)学科理念层面

民俗学的乡土情结需结合社会学的现代性批判,避免陷入乡愁的窠臼;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吸纳民族学的共同体理论,在本土性与共通性之间寻求平衡;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分析则有助于民族学实现动态的族群互动研究。以节庆研究为例,各学科可形成互补视角,民俗学聚焦仪式符号与传承谱系,进而探讨社会资本流动与行动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社会学关注社会组织与功能分析,拓展到节庆经

济的数字平台化;人类学进行跨文化比较,延伸至族群身份政治;民族学从族群认同与边疆实践出发,将节庆仪式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三)实践层面

调查者通过在社交平台发布研究日志、研究视频,公开研究目的与数据用途,取得民众的信任,并吸引一部分感兴趣的民众参与深度调查。还需做下沉式学术,主动介入如小镇做题家等公共议题,撰写能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面向社会读者的民族志作品,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我的二本学生》等。运用专业知识,通过科普短视频、知乎专栏等通俗形式,重建学者与大众的对话以及普通民众对知识分子的信任。

与旧文科相比,新文科在教育背景、培养方式以及培养目的等方面都有明显不同,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新文科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不仅是在文科各学科内部,也是文理科之间的交融。新型综合文科侧重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等学科间的开放共享、相互借鉴。只有文科间的壁垒消除,文史哲及理工农医等学科才有可能进行跨学科合作和创新。新文科与新型综合文科的差别,可以通过表 1 进行对比说明。

表 1 新文科与新型综合文科比较

| 维度 | 新文科 | 新型综合文科 |
|------|-------------------|------------------------|
| 范畴 | 与旧文科相对,涉及整个人文社科领域 | 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实证主义学科 |
| 方法论 | 文理交叉、技术驱动 | 整合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 |
| 研究对象 | 全球化、数字人文、计算语言学 | 学术伦理、生活日常 |

新型综合文科是在新文科建成之前消除学科间壁垒的阶段性任务,通过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统合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新闻学诸学科,与新文科要求的文理交叉和技术驱动有所不同,现阶段主要通过共享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对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动态的学术伦理、应对反智主义和去中心化信息时代以及生活日常研究转向做出回应。教育界对于新文科的期待是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去装老文科的旧酒。以语言学为例,语言学在西方属于自然科学,但在国内划分在中国语言文学大类下。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实证主义学科特点,尤其是应用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相对),重视实证研究方法,关注实际应用。语言学是典型的文理交融,其跨学科示范意义尤为明显。

作为兼具人文属性与科学方法的学科,社会语言学、民俗语言学等应用语言学分支通过方言调查、语料库分析,在方法论上与实证主义学科的田野调查高度契合;同时,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与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的深度交融,更展现了文理交叉的突破性潜力。当前 AI 技术对语言处理的革命性影响,进一步证明了传统文科与新技术融合的必然性——这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实证学科提供了可参照的跨学科范式。

AI 的迅速崛起,一定程度上为人文社科学者提供了新出路,并进一步验证了文科的不可替代性——人文精神是人类唯一可以超越机器的地方。人工智能可以取代许多任务,但它不能取代人类的情感和创造力。现代社会过度推崇工具理性而轻视

人文价值,形成了重理轻文的倾向。文科知识分子应做到在技术颠覆认知的时代,为民众提供安顿人生的伦理框架;同时担任翻译者的角色,将技术术语转化为可供讨论的科普话语。新文科的培养重点是在人工智能时代重申人类社会的人文主义精神。因此,需要重视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例如环保、公平正义等,通过新文科交叉学习建立批判性思维,具备“使用工具而非被工具定义”的自主性。

四、结语

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乃至非遗学均虎视眈眈,要在实证主义人文学界分一杯羹时,如何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并将本学科的特长发扬光大,是实证主义诸学科需要证询的问题。新型综合文科不仅应该扩展研究对象(从乡村到都市,从中国到外国),还应该提升和突破自身的观念限制,积极地拥抱兄弟学科,进行学科对话,而不是因为其他学科挤压、掠夺了自己的研究领地而自怨自艾。享有底层社会资本的民俗学者要避免成为实证主义新文科里反智主义的来源,就要平衡好精英与大众、权威与反叛的关系,重新审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定位。各个学科应该摒弃自身的局限,调整学科视野,坚持走出去,主动寻求合作,共享研究对象,勇于突破研究壁垒,彼此取长补短,为形成新型综合文科而努力,而非自成一家,孤芳自赏,这样,才能化解信息社会中实证主义学科的发展困境。要发扬实证主义学科发现规律以及改造社会的长处,通过价值重塑、话语主导,占据意识形态的高地,激发民众的文化自信,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来自新文科的学术注脚。理科推动技术进步,改变物质世界;文科守护精神家园,解答存在意义;理科

决定我们能走多快,文科决定我们该往哪走,二者并非对立,而是文明进步的双翼。

参考文献:

- [1]高丙中.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新民俗学学科建设[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 [2]徐英瑾. 否思《菊与刀》[J]. 读书, 2022(10).
- [3]刘铨,陈鹏. “底层文化资本”的象征资本问题——阶层突破的评价社会学视角[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5).
- [4]周星. 生活革命、乡愁与中国民俗学[J]. 民间文化论坛, 2017(2).
- [5]Contessa Small. Co-creating Harry Potter: Children's Fan-play, Folklore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D].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2015.
- [6]Lydia Ruth Bringerud. We Get Different Things from the Pain: Kink Play in the BDSM Community in St. John's, NL. [J]. Culture & Tradition, 2019(34).
- [7]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A]. Sean Wilentz.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Uncollected Essays, 1956-1965[C].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2020.
- [8]王希. 反智主义与霍夫施塔特困境[J]. 美国研究, 2021(4).
- [9](美)汉娜·阿伦特.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M]. 安尼,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
- [10](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M]. 赵丽慧,译.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7.
- [11](英)赫克托·麦克唐纳. 后真相时代[M]. 刘清山,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 [12]黄湘. 当我们活在喷子和政治正确者的夹击中[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055702259844009&wfr=spider&for=pc>, 2022-03-24.
- [13](英)克里斯托夫·巴特勒. 解读后现代主义[M]. 朱刚,等,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 [14]施爱东. 民俗学的未来与出路[J]. 民间文化论坛, 2019(2).
- [15](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M]. 何博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1.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 yelirong@126.com